

貨幣、圖像與國家*： 中華民國的臺灣化，1945-2002

林滿紅

前言

1945年10月25日，依照麥克阿瑟命令第一號，日本最後一任臺灣總督安藤利吉（1884-1946）向中華民國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1883-1950）投降。陳儀此項任務受到軍事委員長蔣中正的任命¹。1945年12月17日在重慶的中華民國政府計劃在臺灣流通的貨幣上加上中華民國的國號與紀年。然而，臺灣將使用臺灣銀行所發行的臺幣，中央銀行發行的法幣不得在臺灣流通²。

臺（台）灣銀行成立於日本統治臺灣時期，經中華民國改組。是這個銀行，而非中華民國的中央銀行，承擔了原來日本政府對臺

* 本文另以英文詳版發表於*Twentieth Century China*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42:3 (Oct. 2017), pp. 274-296.

1 國史館，〈中山堂受降檔案分析〉，《國史館館訊》，第五期（台北，2010），頁158-163。

2 〈整理臺灣幣制〉，《天津大公報》，1945年12月5日（重慶二日發專電）；史全生、費曉明，〈光復初期關於臺灣幣制的爭論和臺幣的發行〉，《民國檔案》，2001年第1期（南京，2001.2），頁95-100。

灣銀行券持有者的負債。臺灣與中國大陸雙方的貨幣，如同不同國家間一樣，要計算匯率。在中國大陸，1945年7月3日政府已公布法律取消省銀行發行紙幣的權利；中央銀行在各省設有分行發行印有該行名稱，並有該行建築圖像的法幣³。臺灣則是例外。臺灣沒有建立中央銀行的臺灣分行，而臺幣上印有臺灣銀行總行的建築圖像⁴。

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在臺灣發行新臺幣以取代臺幣。2000年通過的「中央銀行發行新臺幣辦法」明確規定新臺幣為中華民國的國幣。2002年以後，「中央銀行」字樣、該行印章和總裁職章也印在新臺幣上⁵。

2000-2002年的改革源自臺灣內部的民主化。但本文發現，即使在蔣中正統治臺灣期間，1960年以後鈔票圖像上的建築物改為總統府。在1949年到1960年間的「第一印刷廠」或「臺灣銀行印刷所」字樣，1961年為「中央印製廠」字樣所取代⁶。同年，中央銀行在臺灣復業，並開始在紙幣上印製「中央」水印。1964年行政院核定梅花為國花後，梅花不斷出現在新臺幣之上。象徵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與臺灣推動民主體制的中山樓圖像，則於1969年出現在新臺幣之上。這些貨幣圖像透露，即使在蔣中正總統領導下的臺灣，並不是

3 郭榮生，《中國省銀行史略》（台北：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1967），頁127、301。

4 許義宗，《中國紙幣圖說》（台北：江台郵幣社，1981），頁403-424。

5 國史館，《你也可以當總統》（台北：國史館，2012），頁178-180、末頁；《中央銀行發行新臺幣辦法》，<https://www.cbc.gov.tw/public/Attachment/6322152402.pdf>（檢索日期：2018年6月1日）；林邵彥，〈新臺幣圖案的歷史意義——以鈔票為例〉（中國文化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1），頁15-16、36。

6 許義宗，《中國紙幣圖說》，頁403-457。

只在「大中國」的意識形態下發展⁷。將臺灣視為受中國文化和西方民主影響的「小中國」的認知，也影響了臺灣的政治經濟。

在分析1946年到2002年間臺灣貨幣圖像所顯示的中華民國與臺灣越來越是結合的過程當中，本文將指出國際史在其中所發揮的作用。比方說，在蔣中正去世之前，臺灣貨幣上只有孫中山頭像。這受到了二次大戰後期日本所扶持的汪精衛政府的印刷廠的影響。中央銀行在臺灣的復業則得到美國的協助。藉由檢視臺灣貨幣圖像的變化，本文將梳理跨躍1945年和1949年的歷史延續性及斷裂性，以及全球歷史與中國和臺灣歷史間關係等議題。

本文利用國史館和中央研究院存藏的中華民國檔案、新聞、貨幣圖錄等進行研究。全文先描繪1946-1960及1961-1975年間臺灣貨幣上的圖像。隨後將指出蔣中正時期如何為往後臺灣貨幣圖像中的中華民國臺灣化奠基。最後將描述在蔣中正和後蔣中正時期影響臺灣貨幣圖像的因素，並比較傳統中國、1949年以前的中華民國、以及中華民國在臺灣時期的貨幣圖像。

貨幣上的圖像，1946-1960

1946年5月11日，在臺北發行的《民報》（第一期第二頁）報導，臺灣銀行將於5月20日改組後重新運作。臺灣銀行發行的臺幣將循原有臺灣銀行券的管道流通。新舊兩幣的兌換比為1：1。

⁷ Cf. Man-houng Lin, “Taiwan’s Sovereignty Status: The Neglected Taipei Treaty,” in Kimie Hara (ed.), *The San Francisco System and Its Legacies: Continu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Historical Reconcili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pp. 129-135.

臺灣銀行於日本統治臺灣時期的1899年成立。為方便日本資本進出，並加強臺灣與日本本土的關係，日本在1895年5月8日開始統治臺灣後，逐步改革臺灣的貨幣制度。針對臺灣市面上兩百多種的貨幣，臺灣銀行禁止銀元以外的貨幣、未加工的銀塊、中國和香港的銀元流通，銀元限用日本龍銀⁸。

日本龍銀於1871年開始發行。1886年日本開始發行銀元券，建立了銀本位的紙幣制度。1897年日本本土利用馬關條約中的中國賠款，改行金本位。但在習慣用銀的臺灣則先採行銀本位，以銀元或銀元券為主要貨幣。銀元由政府機關收納之後不再支出，對於民間之流通銀元則政府不加干涉。1904年初因銀價相對金價上漲，臺灣人民以銀易金，將蒙其利，日本政府趁機在臺灣改行金本位。但臺灣並無足夠黃金作為準備，是透過法律使臺灣銀行券與有黃金作為準備的日本銀行券等值流通⁹。

在日本統治臺灣初期，臺灣銀行券正面使用龍鳳圖案，印有銀行名號、面額之日英文對照。1918年第一次改版，正面一律印圓山官幣大社臺灣神社圖像，背面印臺灣最南端之鵝鑾鼻燈塔¹⁰。1931年日本進入十五年戰爭期，取消了英文，並改用臺灣銀行頭取（經

8 張翰中，〈戰後初期臺灣貨幣改革之研究——從臺灣銀行券到臺幣的發行〉（台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8），頁31、35。

9 張翰中，頁32-36；Michael Schiltz, *The Money Doctors from Japan: Finance, Imperialism, and the Building of the Yen Bloc, 1895-1937* (Cambridge, Mass.,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26-57；作者於2014年3月8日參訪日本銀行貨幣博物館筆記。

10 許義宗，《臺灣貨幣圖說》（台北：圓融文教基金會，1999），頁56、62-64、66-69、76-88。

理）職章，取代西方式的經理簽名。1937年，百元券正面出現日本皇室十六瓣菊紋徽章，為彰顯臺灣特產，拾圓券印有鳳梨與香蕉底紋。由於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臺灣銀行決定放棄金本位，並將日本銀行券加入臺灣銀行發行準備中，以方便日本調控臺灣的貨幣供給來支援戰爭。這些發展使臺灣面臨通貨膨脹，但幅度較重慶的中華民國小¹¹。

1941年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中華民國正式對日宣戰，並加入同盟國的行列。1942年中華民國外交部長宋子文（1894-1971）發表：「我國戰後決定收復臺灣、澎湖、東北四省等失地」之文告。1943年中、美、英三國共同發表「開羅宣言」，宣布日本戰敗後必須將東北、臺灣和澎湖等領土歸還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政府於1944年在中央設計局內成立「臺灣調查委員會」，著手擬訂臺灣的收復計畫¹²。

到1945年6月以前，臺灣調查委員會幾乎未作出有關臺灣貨幣的任何決定。1945年7月，美國空軍日以繼夜的轟炸日本工業城市。眼看日本投降是早晚之事，中華民國也更積極準備接收事宜。但為免惡化的大陸通貨膨脹波及臺灣，1945年8月至10月間雖有財政部長兼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1898-1960）希望由中央銀行主管臺灣金融，將臺灣金融與中國合一，經行政長官陳儀力爭，美國顧問也支持，中央政府最後決定沿用原臺灣銀行而發行臺幣。陳儀先是阻擋代表法幣的「臺灣流通券」，繼而排除中國大陸的金融體系入主臺灣¹³。

1946年5月20日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正式接收株式會社臺灣銀

11 張翰中，頁39、61。

12 蘇珈瑤，〈從「地方貨幣」到「國幣」：新臺幣相關地位爭議及其影響（1949-2000）〉（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所碩士論文，2013），頁12-18；張翰中，頁45、55、60、62。

13 張翰中，頁45、55、60、62；蘇珈瑤，頁4-5；史全生，頁96-97。

行，並改組成立臺灣銀行，經報奉核定於1946年5月22日發行臺幣（俗稱舊臺幣），僅在臺灣地區流通行使，法幣或金圓券等國幣在此不能通行¹⁴。臺幣上的臺灣銀行與臺幣皆書寫成「台灣銀行」與「台幣」。

針對汪精衛國民政府的中央儲備銀行券與華北的聯合準備銀行券，中華民國占領軍規定這些舊幣的折換率僅為面額的30%。這些地區的民眾對重慶政府的期待，迅速轉為絕望¹⁵。為防止相同的混亂發生，新發行的臺幣，以等值兌換原有的臺灣銀行券。同時，臺幣的發行經歷了一年多的準備期。

孫中山的圖像和印製廠字樣

除了中華民國的國家名稱和紀年之外，臺幣也開始印上在1940年被重慶政府尊為國父的孫中山的圖像¹⁶。在日本統治時期，臺灣的貨幣沒有國家領袖頭像，1946年以後的孫中山頭像則將臺灣的貨幣與國家更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兩千年來，中國人的貨幣並沒有國家領袖頭像。直到1912年3月11日，孫中山臨時大總統批准鼓鑄帶有大總統肖像的紀念幣與流通幣，中國國家領袖的頭像才經過行政程序以貨幣圖像進入人民的日常生活中¹⁷。之後，孫中山頭像一再出現於中華民國的貨幣上。

14 郭榮生，頁127、301。

15 鄭會欣，〈關於戰後偽中儲券兌換決策的制定經過〉，收於吳景平、戴建兵主編，《近代以來中國金融變遷的回顧與反思》（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12），頁312-334，特別是330-333。

16 國史館，《你也可以當總統》，頁19。

17 有關兩千年來之相關變化，詳見：林滿紅，〈兩千年間的「佛」與「國」：傳統中國對西方貨幣領袖頭像的認知〉，《中國經濟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2018年第2期（3月號），

1945年以後，蔣中正頭像才出現在中國大陸的貨幣上。但1945到1949年間，中國大陸的貨幣又有孫中山、又有蔣中正的頭像，臺幣則只有孫中山的頭像¹⁸。

臺灣銀行的第一批紙幣由上海的中央印製廠印製。這間印製廠原是日本支持的汪精衛政府所有。汪政府為強調其繼承孫中山所創中華民國的正統地位，其所發行的貨幣無論面額大小，都只有孫中山頭像¹⁹。在1945-1949年間，政治的動盪和技術上高度依賴這間上海印製廠，是臺幣與中國大陸有所不同的一項原因。

日本統治時期的臺灣銀行沒有紙幣印製廠。當時的臺灣銀行券是由日本印製後運交臺灣使用。戰爭末期因海空交通為盟軍封鎖，改由臺灣銀行自1944年起以甘蔗與香蕉葉纖維平版自行印製，品質粗糙²⁰。這個印刷廠，戰後稱為第二印刷廠，因為技術不足，不再印製紙幣²¹。

重慶政府於1941年成立中央印製廠。1945年9月該廠接收汪精衛政府位於上海的中央儲備銀行印刷廠，成為其上海廠，並奉准運用「中美租借法案」款項，向美國購置新式印鈔設備，於1946年陸續運交，戰時遴選派赴美國學習之技術人員先後返國。第一批臺幣，

(續)——

頁5-22。

18 國史館，《你也可以當總統》，頁134、141-142、170、175。

19 國史館，《你也可以當總統》，頁166；許光、梁直，《日偽政權舊紙幣圖錄》（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5），頁101-136；徐楓、趙隆業，《日偽政權銀行貨幣圖鑑》（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頁81-97。

20 張翰中，頁32-36，頁98-99。

21 中央印製廠編，《中央印製廠建廠六十週年紀念》（台北：中央印製廠，2001），頁84。

是由中央印製廠上海廠印製²²。

1945年戰爭結束，全中國正忙於復員與接收工作，法幣需求量大增，中央印製廠趕不及印製所需紙幣，曾委託國內各書局代印，臺幣是由大東書局承印。大東書局總經理陶百川(1901-2002)於1946年致蔣中正總裁的信函透露，書局在出版方面除為國民黨負責宣傳之外，又為政府印製紙幣²³。

臺灣銀行並邀請大東書局江西廠廠長王兆年（1895-？）來臺建廠，並於1947年8月開工，稱為第一印刷廠²⁴。王兆年之前已有36年的印鈔經驗，曾在財政部與商務印書館的印鈔業務中學取美國和日本的印鈔知識與技術，也在大東書局的印鈔業務中培植很多相關人才。來到台灣後，王同樣以極高的熱忱領導他的部屬²⁵。第一印刷廠1952年轉為臺灣銀行印刷所，而於1961年併入中央印製廠。1949年遷臺的中央印製廠，其設備與人員均來自上海。在中央印製廠的現行印刷廠於1978年建立之前，該廠主要仍沿用1945年由汪精衛政府的印刷廠所提供的技術²⁶。

1949年以來較低面額的新臺幣

1949-1960年間，新臺幣上的國家圖像要素幾乎與1946-1949年

22 中央印製廠編，頁37、45。

23 「國史館檔案」，卷名：鈔券發行印製 137. 001084100A003，檔案號碼：001084100003127a - 001084100003129a。

24 張翰中，頁98-99。

25 國史館檔案，全宗名：軍事委員會侍從室，全宗號：129，入藏登錄號：129000100753A，卷名：王兆年（王雪樵）。

26 中央印製廠編，頁66、84。

的臺幣一致，但面額卻有很大的不同。1946-1949年的面額有1角、5角、1元、10元、50元、100元、500元、1,000元和10,000元，但1949年發行的新臺幣只有1元、5元和10元²⁷。這與該年進行的貨幣改革有關。

1945年以後，臺灣的通貨膨脹更為惡化，原因有三：一為軍政機關的借款，如臺灣糖業公司奉政府命令捐獻，又缺乏營運資金，只能向臺灣銀行借貸。二為戰後復員建設的借款。1946年時此種放款占臺灣銀行放款總數的76.91%，隔年還增長至80%以上²⁸。三為行政長官公署訂定一元臺幣兌三十五元法幣之低估臺幣匯率，其後雖採機動調整，但一直跟不上法幣貶值的速度，造成大量法幣換取臺幣的現象²⁹。從1949年1月到6月，躉售物價指數平均每月上升57.25%³⁰。

嚴重的通貨膨脹使臺幣瀕臨崩潰。1949年6月15日臺灣省政府公布「臺灣省幣制改革方案」、「新臺幣發行辦法」，發行新臺幣取代臺幣，臺幣4萬元折合新臺幣1元，限期兌換³¹。

1949年12月9日，中華民國中央政府遷移臺灣，財政赤字占中央政府支出31.6%。藉由美國在1950-1965年間的援助增加生產和出口，臺灣銀行不再需要過度發行貨幣，在穩定的購買力基礎上，新臺幣維持其低面額³²。由於交易額的增加，1961年開始發行100元面額，接著是1976年的發行500元和1,000元面額，和2001年的發行200元和2,000

27 中央印製廠編，頁61-63、頁74-86、頁88-91。

28 程世仁，〈國家建立與中央銀行之復業〉（東吳大學政治學系碩士論文，2003），頁43。

29 張翰中，頁86，102-103；程世仁，頁43。

30 吳聰敏，〈臺灣戰後的惡性物價膨脹（1945-1950）〉，《國史館學術集刊》第10期（台北，2006），頁148-154。

31 陸大同，〈我國中央銀行沿革及幣制演變〉（未出版手稿）。

32 吳聰敏，頁148-154。

元面額。未曾出現1949年臺灣的一萬元或中國大陸的六十萬元面額³³。

1949年-2002年的「臺灣銀行」字樣

從1949年到2002年，「臺灣銀行」字樣在臺幣上持續出現，臺灣銀行的「台」字轉為繁體的「臺」³⁴。

1949年中國、交通、農民三家國有銀行與中央銀行同時遷臺，但組織、人員都大幅縮減。中央銀行僅餘六個單位，職員只剩140人。在中國大陸，中央銀行有71家分行，但在臺灣一家也沒有³⁵。其他三大銀行，也只在臺灣設立總管理處，且在臺灣島內未重新營業，僅中國銀行的海外分行維持業務。

行政院於1951年5月頒布「中央銀行監督指揮臺灣銀行新臺幣發行業務辦法」。但因中央銀行職員人數只剩140人，包括貨幣發行、國庫收支、外匯等業務，均由臺灣銀行代理。此時臺灣銀行同時承擔一般商業銀行與中央銀行的雙重任務³⁶。

臺灣貨幣圖像的統一

在1949年之後，中華民國的貨幣以統一的圖像在臺灣各地流

33 國史館，《你也可以當總統》，書末摺頁。

34 國史館，《你也可以當總統》，書末摺頁。

35 陳思宇，〈冷戰、國家建設與治理技術的轉變：戰後臺灣宏觀經濟治理體制的形成（1949-1973）〉（台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1），頁155-156。

36 國史館，《你也可以當總統》，頁178-180；林紹彥，頁15-16、36；郭榮生，頁129；蘇珈瑤，頁31、36。

通，只有金門、馬祖和大陳等反共前線地區略有不同。

大陳、金馬曾使用與臺幣或新臺幣形式、面額大致相同的貨幣，但為如「限制金門地區使用」的地名券。大陳於1955年淪陷，金門、馬祖之地名券則於2002年6月30日配合「金門新臺幣行使辦法」、「馬祖新臺幣行使辦法」廢止，停止流通³⁷。

相對於印鈔技術之受大陸時期中華民國影響，戰後臺灣統一的貨幣圖像則繼承了戰前的臺灣。日本政府將原為200多種的臺灣貨幣加以統一。在原有貨幣之中，即使是清朝政府鑄造的制錢也不是國幣。不同的地方或部門的鑄局鑄造只供該地方或部門使用的制錢。這種中國傳統可以追溯到西元前770年至西元前255年使用布幣或刀幣的時期，也影響了朝鮮、越南和日本³⁸。在大陸時期的中華民國，當中央銀行與另外三個在中國大陸的官方銀行發行貨幣時，外國或本國的民營銀行也發行不同種類的貨幣。特別是在其他政權林立之時，它種貨幣與在重慶的中央銀行發行的貨幣並存。戰後的中華民國在日本統治時期統一的基礎上建構國幣。195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西藏採用人民幣之後，也完成了貨幣的統一³⁹。這些都揭示了中國幾千年歷史的新發展。

1960年代的重要改變

37 臺幣新臺幣圖鑑編輯委員會編，《臺幣·新臺幣圖鑑》（台北：中央銀行發行局，1998），頁109-113。

38 J. H. Stewart Lockhart, *Currency of the Farther East: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up to 1895* (Hongkong: Noronha, 1907), vol.1: 5-10, 22-23, 45, 56, 61-67, vol.2: 1-12, 66-68, 74-89, 127-129, 138-142.

39 中華人民共和國貨幣統一過程詳見董志凱，〈人民幣之初〉，《黨史文匯》第9期（1995），頁17-20。195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採行人民幣改革，以一萬元舊幣換一元新幣。

1960年代，中華民國進一步將其貨幣圖像臺灣化。

總統府、中央印製廠與梅花

1961年臺灣紙幣背面的建築由1946年以來的臺灣銀行總行改為總統府，而正面仍維持孫中山的頭像⁴⁰。

在1945至1949年間的臺幣時期，紙幣上印的承印單位有中央印製廠及第一印刷廠。但在1949年印新臺幣之後，1949年到1959年間臺澎部分的承印單位轉為臺灣銀行印刷所，金馬地區則主要依然為中央印製廠（或中央印製廠臺北廠）及第一印刷廠，偶而馬祖出現臺灣銀行印刷所。臺澎部分，1960年未印承印單位，1961年以後則改為中央印製廠⁴¹。

1964年中華民國行政院核定梅花為國花⁴²。它經常出現在中華民國的貨幣上：1969年5圓紙幣上有梅花水印，拾圓紙幣上除了有梅花水印，還有梅花紋飾鑲在「拾圓」兩字周邊⁴³。1976年版10圓、50圓、100圓、500圓、1000圓紙幣的幣值的上下或左右都有梅花裝飾⁴⁴。1988年新臺幣首度提供協助盲胞或失去視力者的盲人點，是以梅花來表示⁴⁵。

40 日本臺灣總督府於1919年落成。1945年因美軍轟炸而受到相當程度的損壞。中華民國在1946-1948年間予以修復，並於1950年之後用為總統府。參見林滿紅主編，《總統府一樓展覽「從總督府到總統府」：建築的故事》（台北：國史館，2009）。

41 許義宗，《中國紙幣圖說》，頁403-457。

42 中華民國總統府網站為<http://www.president.gov.tw>。

43 許義宗，《中國紙幣圖說》，頁426，430-433。《中央日報》（台北），1961年12月3日，版5。

44 簡義雄，《臺灣錢淹腳目》（台北：作者自印，2006），頁245。

45 臺幣新臺幣圖鑑編輯委員會，頁22。

大陸時期的中華民國政府，有時會將黨徽用在貨幣上⁴⁶。1928年和1930年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在第一條或前言規定由國民黨領導國民政府⁴⁷。這與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相同。相反地，1947年在中國大陸公布而主要在臺灣實施的中華民國憲法，絲毫沒有提及領導的政黨。這透露了臺灣時期的中華民國較為強調國家，而在中國大陸時期則較為強調政黨。

中山樓的出現

中山樓的建築圖像1969年開始出現在新臺幣上。這棟建築於1966年11月12日落成。11月12日是孫中山的誕辰日。這棟建築用以紀念根據西方民主理念建立中華民國，並宏揚中國文化的孫中山。相對於中國大陸於該年展開文化大革命，11月12日這一天也是在臺灣的中華民國的中華文化復興節⁴⁸。

清代民間紙幣有時會刻印〈朱子治家格言〉⁴⁹。儒家符號在1912年以後的出現，最明顯的是與日本合作政權的貨幣。孔子與孟子頭像出現在滿州國和華北的聯合準備銀行的貨幣上⁵⁰，南京與重慶國

46 有關大陸時期中華民國硬幣上的黨徽圖像可參考：Write, Richard N J. Joe Cribb and Helen Wang (eds.), *The Modern Coinage of China 1866-1949: The Evidence in Western Archives* (London: Spink, 2012), p. 16.

47 國民政府秘書處，《國民政府公報》，第99號第13期（1928年10月8日）；1930年第631號命令（1930年11月17日）。

48 林紹彥，頁56。

49 林滿紅，《銀線：十九世紀的世界與中國》（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頁175。

50 國史館，《你也可以當總統》，頁162、163、165、166。

民政府的紙幣圖案上有孔廟、至聖林⁵¹。但都不如1969年出現在新臺幣上的中山樓那般，是統治者領導的儒家文化復興運動的一環⁵²。

中山樓也是國民大會開會選出總統的場所，象徵著中華民國的民主體制。

「中央」水印

中央銀行至1961年方始復業，並逐漸取代臺灣銀行之發行貨幣業務。1961年所發行壹圓紙幣出現「中央」水印，之後1964年的50圓、100圓紙幣上及1968年的5圓及1969年的10圓紙幣上也有「中央」水印⁵³。

1949年中央銀行遷臺，但由臺灣銀行承擔該銀行的責任，產生許多問題。臺灣銀行隸屬於省政府之下，但有關國家經濟政策，究竟聽命於中央政府還是省政府常產生衝突。另外，臺灣銀行沒有能力進行公開市場操作，以便在經濟力提升時，增加貨幣供給，來滿足貨幣需求。1959年6月11日，美國國際合作總署駐華共同安全分署署長郝樂遜（Wesley C. Haraldson）提出「加速經濟發展計劃綱要」八點作為中華民國的施政參考，在當時受到社會的廣泛關注。中華民國的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於1959年12月公布十九點財經改革措施，以為因應。其中第十五點和第十七點內容「將建立中央銀行制

51 許義宗，《原色中國紙幣圖說：中央、中國、交通、中國農民銀行篇》（台北：許義宗自印，1994），頁38-39、170-174、180、185；許義宗，《中國紙幣圖說》，頁64-66、275-276、286。

52 教育部文化局編，《中華文化復興：蔣總統文告暨訓詞》（台北：教育部文化局，1971），頁1-3。

53 許義宗，《中國紙幣圖說》，頁426，430-433。

度，使負責調整利率，進而對信用加以控制，以穩定經濟。」⁵⁴

在中華民國的政治經濟領袖與曾服務於美國聯邦準備銀行多年的美國顧問鄧明（F. L. Deming）及李安樂（R. F. Leonard）的合作下，1961年6月中旬完成「中央銀行復業方案」。經蔣中正總統核定後，中央銀行於1961年7月1日復業⁵⁵。在這過程中，美國不只在中央銀行復業時提供建議與諮詢，也幫助其業務運作。1964年12月，拋售美援物資累聚的相對基金構占中央銀行準備金的72.1%⁵⁶。美國也協助在臺灣境內或海外培育中央銀行在會計以及統計方面的人才，並購買所需設備⁵⁷。

後蔣時期出現的「中央銀行」字樣

1961年行政院院會通過、總統核定的「中央銀行復業方案」僅為行政命令⁵⁸。一直到1979年11月8日才有經立法院修正通過的「中央銀行法」公布⁵⁹。但新臺幣由臺灣銀行發行改由中央銀行發行，並在法律上取得完全的國幣地位又要等到2000年。從2002年起，新臺幣上也出現「中央銀行」字樣。

1979年中華民國《總統府公報》所公布的「中央銀行法」。其第十四條，「本行於必要時得分區委託公營銀行代理發行貨幣，視同國幣。其有關發行之資產及負債，均屬於本行。」加強了新臺幣

54 Wei-chen Lee and I-min Chang, "US aid and Taiwan," *Asian Review of World Histories*, 2:1 (January 2014), 47-80: 65-66

55 蘇珈瑤，頁42。

56 劉進慶，《台灣戰後經濟分析》（台北：人間，1992），頁291。

57 陳思宇，頁15-156。

58 程世仁，頁152-153。

59 總統府第三局，《總統府公報》，第3588號。

的國幣地位，但新臺幣之取得國幣地位，還得面對銀元的國幣地位問題。

1935年發行法幣之後，到了1948年通貨膨脹已經嚴重，蔣中正總統於是在1948年8月19日依1948年5月10日公布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頒布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制定公布「金圓券發行辦法」，以1比300萬的比率回收法幣，正式承認法幣破產，並規定中華民國之國幣以金圓為本位幣。又因進一步的通貨膨脹，行政院會議於1949年7月2日依「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決議，制定公布「銀元及銀元兌換券發行辦法」，規定中華民國國幣為銀元，將幣制又恢復為銀本位制⁶⁰。

由於此銀元未曾在臺灣使用，臺灣在1949年6月15日以後的公私收支均使用新臺幣，新臺幣與黃金、外匯聯繫，具有本位貨幣效能。面臨銀元與新臺幣兩本位幣並行，1950年行政院決議，各機關將核定之銀元數一律按一比三折算新臺幣。此折算率是依該年年底最後一次牌告兩幣比價訂定，從此未再變動。新臺幣則一直未在法律上取得如同銀元般的國幣地位⁶¹。

1992年8月5日李登輝總統因為該年「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的廢除，明令廢止「銀元及銀元兌換券發行辦法」。1992至2000年間中華民國在法律上沒有國幣，於是有2000年（民國89年7月1日）「中央銀行發行新臺幣辦法」之頒行⁶²。根據2000年（民國89年4月15日）制訂公布的「中央銀行委託臺灣銀行經理新臺幣發行附隨業務辦法」，臺灣銀行仍負責新臺幣在各地之運送、調節及回籠券之

60 張翰中，頁12；陸大同，〈我國中央銀行沿革及幣制演變〉。

61 蘇珈瑤，頁50；陸大同，〈我國中央銀行沿革及幣制演變〉。

62 陸大同，〈我國中央銀行沿革及幣制演變〉；蘇珈瑤，頁72-73、

80-81。

整理。經過這些立法，中央銀行才完全執行該行應有之職掌，它所發行的新臺幣才在法律上取得完全的國幣地位。2002年（民國91年7月1日）起，所有1999年以前發行的新臺幣都要回收。2002年7月開始，中央銀行發行印有「中央銀行」字樣及「中央銀行」印章和「中央銀行總裁」職章的新臺幣鈔券⁶³。

2002年之後，也出現了小學生在地球儀上尋找臺灣的位置、棒球球員、臺灣特有的魚類、鳥類和山岳等圖像。但孫中山頭像與很多蔣中正總統時期的新臺幣圖案，包括總統府、中山樓、中央印製廠字樣等在西元2002年之後依然存在⁶⁴。

在2000-2002年改革的前夕，孫中山和蔣中正的圖像都幾乎遭到移除。在抗議者的反對之下，中央銀行予以保留⁶⁵。即使綠色的美鈔為世界各國所喜，綠色、印有蔣中正頭像的200圓鈔票並不太流通。反之，紅色的孫中山頭像，就臺灣民俗而言，較為喜氣，加上100較方便累計，則流通甚廣。

代表豐收的稻穗在民國初年的硬幣上經常出現，在2002年版的50圓新臺幣硬幣背面的稻穗，有類似意義。在2002年版的100圓、200圓、500圓、1000圓、2000圓面額新臺幣紙鈔上，可分別看到傳統中國民間紙幣常用的梅蘭竹菊松圖案的透光水印。在紀念民國百年的10圓硬幣之0字內有臺灣與梅花之隱藏圖案，往左傾斜是臺灣，往右傾斜是梅花⁶⁶。即使中華民國的貨幣在2002年之後在法律層面完全

63 國史館，《你也可以當總統》，頁178-180；中央銀行網站（www.cbc.gov.tw），央行主管法令規章，「法規體系查尋」及「發行」部分；林紹彥，頁15-16、36。

64 許義宗，《中國紙幣圖說》，頁403-424、432-438，林紹彥，頁64。

65 林紹彥，頁64。

66 <http://www.currency.cbc.gov.tw/tbl.htm>(中央銀行網站新臺幣介紹)。

與臺灣結合，在國家符號及文化象徵上，與1949年以前的中國仍有所聯繫。

結論

蔣中正經常被認為在其統治臺灣期間強調「大中國」政策。但在貨幣圖像方面，他已經開始使中華民國臺灣化。即使沒有證據指出他曾為這些貨幣圖像發布命令，但相關的貨幣制度是根據他的命令建立，而這些貨幣圖像他畢竟都看得到。從1946年到1960年，臺灣銀行發行的臺幣或新臺幣有了孫中山的圖像和中華民國的紀年。而在1960年代，總統府、中央印製廠、梅花和「中央」水印的出現，並全保留於現行的新臺幣之上，都指出了中華民國與臺灣的結合。

中華民國貨幣圖像的臺灣化過程，在蔣中正時期與後蔣時期的促成因素則有所不同。在蔣中正時期，較受國家安全備受威脅與國際因素影響。後蔣時期則在國家較趨安定之際，較由國內的法律程序推動。

中山樓自1969年起在新臺幣上的持續出現，顯示中華民國在臺灣時期試圖保留自傳統中國時期延續的中國文化。臺灣繼續使用中華民國的國號、紀年與紙幣印刷技術，都表達中華民國在臺灣時期與1949年以前的中華民國或傳統中國的延續性。另一方面，中華民國在臺灣時期承續日本統治時期貨幣圖像的統一，則與1949年以前的中華民國或傳統中國截然有別。

1945年政權移轉期間，沿用日本留下的臺灣銀行作為準中央銀行，曾有美國建議。美國的援助強化了中華民國印製紙幣的技術，並協助穩定了臺灣銀行所發行的新臺幣。1961年中央銀行的復業受到了美國的建議與協助。

臺幣圖像也受到日本影響。1946-1975年間臺灣貨幣上的孫中山頭像，受到日本所支持的汪精衛政府的影響。在清末到1949年以前的中華民國紙幣中，長期延續匯豐銀行在鈔券上有銀行經理簽名的西方習慣⁶⁷，只是在廣州中央銀行成立之前的鈔幣，還是以英文簽名，之後則以中文簽名，一直到原擬使用的臺灣流通券都是如此⁶⁸。但1946年迄今，臺灣發行的紙幣都只有「臺灣銀行經理」或「中央銀行總裁」職章，而無其簽名字樣或姓名章，這應是受1931-1945年間日本與英美作戰，消除臺灣貨幣上的英文或西方習慣的影響。

1961年中央銀行於臺灣復業，主要根據行政院頒布的行政命令，而非經過立法院修法。相對的，1979年「中央銀行法」修訂是由行政院順應輿論，在立法院提出並獲通過的修正案。1992年，臺灣的立法委員由主要由大陸選出改為主要由臺灣選出。2000年的新臺幣修法主要由1992年改選後的立法委員提出。中央銀行先是有所保留，但在這八年的過程中，憲法修訂為由自由地區選出中華民國總統、副總統與中央民意代表，整個臺灣的國家認同也顯著往中華民國的有效統治範圍移動，央行終於表示接受⁶⁹。中央銀行的英文行名於2007年由Central Bank of China改為The Central Bank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⁷⁰。相對於蔣中正總統統治時期，後蔣時呈現了政府與公民社會透過法律程序的更多互動。

即使有這麼一個顯著對照，在究竟是銀元還是新臺幣是國幣的

67 張敦智，〈清代民間紙幣編排設計之研究〉（雲林：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設計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3年），頁117。

68 中央印製廠編，頁38。

69 蘇珈瑤，頁56、69、72-73、80-81。

70 <http://www.cbc.gov.tw/ct.asp?xItem=23993&ctNode=302&mp=1>. (中央銀行網站)

爭議上，也呈現在蔣中正總統時期，仍有政府與公民社會透過法律的互動。新臺幣未在法律上取得國幣地位，偽造新臺幣的量刑較輕，導致新臺幣的偽造猖獗，因此將新臺幣納入「妨害國幣懲治條例」適用範圍的呼聲四起。在1961年中央銀行復業，新臺幣發行權由中央銀行收回後，各方又籲請大法官依環境與條件變遷重新解釋新臺幣的性質。1962年大法官解釋第99號，是政府單位首次公開認可新臺幣具備國幣性質⁷¹。

在戰後初期的臺灣，遷臺的中華民國政府與在日本統治時期有深厚日本關係的臺灣商人高度合作以發展國家經濟⁷²。根據本文所述，由戰後臺灣的貨幣圖像，可充分看到中華民國的臺灣化。兩者都呈現中華民國在政治經濟層面的務實發展。

林滿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師大歷史系教授。所著專書包括《銀線：十九世紀的世界與中國》、《茶、糖、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1860-1895》、《獵巫、叫魂與臺灣定位》，與論文80餘篇，主要由貿易、貨幣、條約與政治經濟思想等角度探討全球史中的中國近代史與臺灣近代史。

71 蘇珈瑤，頁51。

72 Man-houng Lin, "The Survival of Economic Elites during Regime Transition: Government-Merchant Cooperation in Taiwan's Trade with Japan, 1950-1961," in Shigeru Akita and Nicholas J. White (eds), *International Order of Asia in the 1930s and 1950s: Contexts, Hypotheses and Scope* (London and New York: Ashgate, 2009), 275-301.